

〔英〕阿瑟·马威克 著

一九四五年以来的 英国社会

商务印书馆

K561.5

85399

一九四五年以来的英国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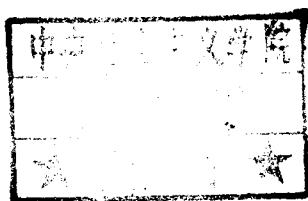
〔英〕阿瑟·马威克 著

马传禧 韩高安 尹鸿鹏 译

汪 璜 校



200223677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年·北京

Arthur Marwick
BRITISH SOCIETY SINCE 1945
Penguin Books Ltd., First published, 1982
根据企鹅图书公司1982年第一版译出

DB94/05

YIJIUSIWU NIAN YILAI DE YINGGUOSHEHUI

一九四五年以来的英国社会

〔英〕阿瑟·马威克 著

马传禧 韩高安 尹鸿鹏 译

江 璜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县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096-9/K·196

1992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22千
印数 0-1100册	印张 9 3/8 插页 1

定价：4.70 元

译 者 的 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五年中,英国经历了战后重建、经济恢复的十余年后,进入相对地迅速发展时期;于是朝着“通向自由之路”,敞开了对美国及欧洲大陆的大门,支持私人企业,提倡“富裕社会”,自由和放纵,并在经济上取得显著成就。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通货膨胀,生活腐化,道德堕落,阶级矛盾,特别是同移民的种族矛盾加剧和失业问题。人们失望、不满,“英国在衰亡吗?”“出了什么毛病?”于是作者试图从社会原因中找出答案,其论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制度、民意、人口、劳动、种族、习俗、宗教、伦理、人的行为、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等等以及大量的统计资料。作者特别注意论述六十年代英国社会的动荡,并探讨今日和将来,以及“稳定”和“社会的一致”究竟是不是英国社会生活真正完整的特征。

作者是通过观察表面现象和论述问题以示客观公允的;他不肯透过现象深究社会制度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等根本原因,反而倾向于“阶级合作”。尽管如此,本书对于了解英国社会、民情以及“福利国家”的福利措施(如国民保险、国民保健、国民教育等等)的利弊,不失为有一定参考作用的资料。

限于我们的翻译水平,加上缺乏专业知识,译稿中错误肯定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目 录

主编的话	1
序言	4
引言 “过去的情况如何?”或“毛病何在?”	5

第一部分 社会的一致(1945—1957)

一 英国之行	15
二 吸引所有人的主题——阶级	31
三 福利国家	43
四 家、家庭和街头角落	57
五 简朴的文化	71
六 再论一致性	98

第二部分 通向自由之路(1957—1972)

七 富裕社会、家庭用具和工作	109
八 评论、时装用品商店和流行音乐	120
九 维多利亚时代的结束	144
十 社会结构与社会紧张关系	157
十一 虚假的乐观情绪	177

第三部分 困难时期(1973—1980)

十二 人造岛上的不景气	185
十三 阶级、种族和民族主义	203
十四 生活水平	229

十五	“半夜里我要个男人”	245
十六	宽容与对抗	259
结论	历史的混乱	274
	资料来源的注解及进一步阅读的指南	278

主 编 的 话

历史学家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各种问题作出回答时，几乎意识不到时代的进程，他们研究的焦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十九世纪，欧洲所有国家及美国都汲汲于探讨其本民族的起源问题，因为他们需要铸造一个不仅对现在而且对将来都有意义的活生生的过去：十九世纪的兰克、麦考利、米什莱、班克罗夫特以及其他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是全神贯注地这样去做的。由于英国的民族特性看起来是与法定的公民权、自由权、自由、特别是民主等的演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毫不奇怪，越来越多的专业历史学家倾其全部本领和兴趣研究宪法史、法律史和政治史，以及十九世纪末，在第一次制订大学教学大纲时，这些学科在大学教学大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以及接踵而来的经济灾难大大推动了外交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工作。一般说来，外交史吸引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保守派的历史学家，经济史则吸引了激进派的历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学家对外交史的兴趣首先消失了，或者，毋宁说是转向了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经济史逐渐陷入了职业性困境而发展为一种混浊体——定量学家和计量经济学家插足进来，社会学家，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家也打入了，他们希望确立一种思想，以驳倒经济史领域中曾盛行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解释历史的方法。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工业社会的各种问题，变得复杂多了。极大的经济增长率（近三十年一直如此）产生了它特有的社会紧张局势，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除经济增长率以外，高度

工业化社会的性质还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持续了一万年的各种习俗惯例,不仅在西方,也在东方,似乎都忽然陷入垂危之中。近二十年来,历史学家对以下各种问题很快产生了兴趣:如人口统计学、家庭的性质、妇女、儿童、奴隶和仆人的地位、闲暇时间的利用、印刷术的影响、艺术的发展、社会如何为自身创造形象的重要性,以及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阶级的形成等问题。一部新的社会历史的全景展现在学者们的眼前,并引导他们研究各种问题,在以前的历代历史学家看来,研究文物者,才会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自然,其他各种类型的历史并未消亡,即使某些已如历史僵尸。但是,毫无疑问,人们对历史的想象力,不论好坏,已受到社会史熏陶了。譬如说,近十多年来,关于死亡问题的著作,其数量之多,堪与研究儿童或婚姻问题的著作相比轻。

社会历史学一直存在着渐渐演变成叙述性历史学的危险趋势。社会历史学的这种危险的发展趋势虽然是现在爆发的,但从某些方面来看,却是源远流长,可以从G.M.特里维廉追溯到麦考利和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叙述性历史学叙述人们如何生活和消磨时间,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试图分析人们的生活、信仰及活动为什么是这样的。此外,历史学家,甚至很好的历史学家过去援引的证据仅仅给人们一般的印象——如日记、书信、个人回忆,加上从研究民间传说者和文物研究者那里搜集的资料。自然,这些证据的大部分是同文化阶层有关系的,而直到最近,这个阶层的人数在英国并不很多。

为了使这种历史资料更为精确,人们一直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或资本主义的社会学理论,而且,在论述死亡、出生、儿童教育或妇女地位等问题时,常常采用现代心理分析的方法。虽然这种方法产生了一些荒谬言论,特别在儿童史方面是这样,但总

的看来，它对这个问题是很有思想影响的。

同经济史的情况一样，为了对社会史的一些根本问题——如家庭的平均人数和家庭的性质问题（包括核心家庭或人口繁衍的大家庭）、男女结婚年龄、死亡率和死亡年龄——提供统计数字的根据，人们也一直进行了试图说明历史证据的数量的大量活动；甚至曾做出努力来说明人们的文化程度。人们汇集了堆积如山的数据，计算机欢乐地哼哼一阵，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得到的结果仍然是极堪探讨的。十九世纪以前，保存的史料无规律性，其可靠性不易验证。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未知因素——即人口究竟有多少，毫无记录，出生、婚姻和死亡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也没有记载下来。实际上，人们获得的结论大都易于受到批评，必须对它们持深深的怀疑态度。纵然如此，关于家庭及其规模、关于婚姻、关于私生子、关于死亡年龄的概数，现在看来都还比较可靠，正因如此，它们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英国的生活。

虽然统计数字可以为社会勾勒轮廓，但不能绘制它的全貌。社会的历史仍然依靠着大量的史料。先前，社会历史首先依靠书信、日记和富有想像力的文学，然而，尽管这些史料仍然有着最大的价值，但是现在人们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人为的东西上：如注意研究房子和花园、报纸、票据和贸易卡、车辆、工具、体育和游戏以及玩具等。实际上是把注意力放在各种能帮助说明生活方式的东西上，以及如何走向未来或者依恋过去。由于社会历史扩大了广度和深度，包罗万象，它已成为一门更为复杂而又使人思想振奋的学科。

在过去十年中，有关英国社会史的专著和论文，像原子弹爆炸形成的蘑菇云一样，迅速增多了。因此，努力对它进行综合工作的时期已更为成熟了。

序 言

一部这样篇幅的书，难免需有所节略。让我首先着重指出，我的书名已说明它的涵义：这部大不列颠的社会史并不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社会史。仅仅当北爱尔兰的什么事件影响英国本土时，或者，书中所用的统计数字碰巧指的是整个联合王国，在这种情况下，才涉及北爱尔兰。

我论述文学、科学、哲学和艺术的地方，没有列出这些领域每一个杰出的人名。总的说来，我一向关注的是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问题，而不专门关注孤立的个人成就和1945年以后在英国社会发展中那些显然构成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人；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成名的人士就略去了：例如萧伯纳和萨默塞特·毛姆。

这部丛书的总编辑杰克·普隆姆、图宾根大学克里斯托弗·哈维教授、我的同事蒂姆·本顿和亨利·考珀博士对全书提出过建设性批评，给了我有益的指导，我十分感谢；苏萨兰德提出了专门家的建议，谨此致谢；卡伦·史密斯以她那经常堪称模范的巧手为书稿打字；安吉·露特为我校阅清样，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对允许我从《环顾庄园》中引用《向创始人致敬》一诗，特向诗人金斯利·艾米斯和伦敦出版商乔纳森·开普以及纽约出版商哈考特·布雷斯·约瓦诺维奇致谢。

引 言

“过去的情况如何？”或“毛病何在？”

剥猫皮究竟有多少方法，谁都没有确切说过。撰写一部1945年以来的英国社会史或许有大约同样多的方法。研究各种社会，需要研究一些基本因素、惯例和概念，例如人口、家庭、住房、饮食习惯和社会阶级等等。因此，社会史可以写成一部关于这些领域发生的主要变化和发展情况的较公正的著述。当然，如果有人要确定“情况如何”，这些年来生活是怎样的，以及要抓住社会变化的性质和变化的程度，那么拥有基本的事实和数字是必不可少的。但是，1945年以来的英国经历要求人们大书特书。

初看起来，将英国1945年和1979年两届大选的情况放在一起，加以对比，就能看出英国的全部经历。1945年的大选使工党第一次取得决定性胜利；而1979年的大选则使新的保守党政府掌握了政权，它公开宣称的目标是完全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整个方针。人们有可能要说，1945年，英国在工党政府的统治下，曾致力于寻求新的前景；到1979年，英国却认为，这个国家要解决三十年来接连发生的全部问题，唯一出路在于选举一个由女首相领导的激进的保守党政府。然而，选举的实际数字会使人停下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1945年大选中，实际投票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八投票选举工党，百分之三十九点八投票选举保守党，有百分之二十的选民根本没有投票。1979年，投票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九投票选举保守党，但百分之三十六点九的人仍

然选举工党，将近百分之三十的选民根本没有参加投票。谈到选民这样做还是国家希望那样做，显然是荒谬的。事实是某些人选举这个党，另外一些人选那个党。选举当然是政治史中的有关键意义的事件，是在选票微弱的差数上进行关键的斡旋，但在社会史上，选举更显露了英国社会内部的连续性。暗讽一切的“英国的经历”的确是有危险的，只要不掩盖现实中的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集团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的，那么“英国的经历”这一短语即使作为一个速记的词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毛病何在？”这个普遍提出的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题目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它一直是英国最近的历史著作专门论述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已成为当代英国社会史的一个部分。当然，不同的作者思考的问题是不同的：某些作者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胜利同八十年代的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软弱无能相对比；另一些作者把1945年的热情的理想主义同1981年英国生活中许多表面现象相对比。彼得·卡尔沃考勒西在他的《英国的经历：1945—1975》一书中论述1945年工党大选胜利时，写到：选民希望和认为“工党在消灭绝对贫困和极度不平等现象方面将取得迅速进展”。他的书将是“失败使希望化为泡影的故事”，这些失败主要是由于经济上的错误的经营管理方法、财政上的估计错误以及“极端不平等和过分的保密性”这两大弱点造成的。然而，对卡尔沃考勒西来说，1975年，仍有“许多客观理由对英国的形势表示乐观”。卡尔沃考勒西在很大程度上曾是一向生活舒适的自由党左派的发言人：许多事情虽然失败了，但并非不可救药的。上流社会的前社会党人和平民社会的保守党人中间那许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处境的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十分不同，他们构成了七十年代末保守党的先锋队伍：激进的新右翼。1977年，他们中间的几个人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不可实现的未来》。该书对美国人提出严重警

告：如果美国人仿效英国这种徒劳无益的做法，把重点放在分配财富和提供社会福利方面，很少强调真正创造财富，过于自信地依靠经济增长的必然性，但又不努力把根本的概要弄清楚，还过于轻易地向既得利益者和压力集团作出让步，美国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激进的右翼说，英国曾企图将自己和它的人民同自由市场的真正的调节力量隔离开来的时间太长了。

但是，在美国出版的那本书却遭到了反驳，《华盛顿邮报》驻伦敦记者伯纳德·诺西特也写了一本书：《英国：可实现的未来》。尽管诺西特认为英国的社会的、尤其是种族的不平等是严重的弱点，他还是提出这个论点：英国非但不是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还是圆满地使自己适应工业后期文明现实方面走在最前列的国家。他说，英国明智地决定宁愿采取从容不迫的发展速度和谋求高质量的生活，不愿狂热地强调辛苦工作，认为对经过充分调整的后工业社会来说，旅游业和“文化”事业是当然的行业。但是，感觉不自在的保守党左翼却极少接受：内城区贫乏、高失业率、持续的污秽和不平等，他们声称所有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1945年工党政府没有立刻抓住机会在当时当地进行重建战后社会的工作。1978年出版的杰里米·西布鲁克的关于“劳动人民与工人运动的理想”的一个调查报告，其题目竟然是《毛病何在？》。

正因为没有“毛病何在”这一个问题，所以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回答或一套回答。从某方面来讲，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这势必直接意味着一种限定的政治观点。如果重复前边的观点，这是由于英国一直是有不同浓淡色彩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愚昧的国家。然而，我的确打算使这个问题成为本书阐述的三个中心主题之一，尽管要以更加详尽的方式阐述它。看来，任何一部社会史的内容绝不仅仅是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叙述，它的核心部分就须是这些问题：1945年的许多崇高的愿望是怎样出岔子的，1945年以后，多年来，

各政党的领导人是怎样就有关英国社会发展的某些设想取得一致意见的,而最后事实表明这些设想又是十分严重的错误的。实际上,问题在于: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失败是非常明显了;但在本世纪的前二十五年内,失败根本不是这样明显的。任务是在乐观的鲜花和明显成功的果实中,探究比较长期失败的各种根源。

但是,社会各种趋势在同时朝着各种方向发展:虽然对崇高愿望的背离可能是一个无情地发展着的问题;但英国社会也在发生许多其他有重要意义的情况。至于第二个主题,我打算集中论述在所回顾的阶段的中期,英国是如何从旧时代的各种限制和控制中获得伟大的解放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考虑政治因素。当提到商业电视、妇女解放、“流产法”、降低参加选举年龄以及“赌博法”时,你们可能会发现,对于上述问题,人们由于政治或道德的原因而意见分裂了,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但是,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同一运动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运动中,家长式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种种控制,已从英国社会消除了。六十年代发生的社会变动,至少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发生的社会变动同样巨大。它们会对英国社会产生不可改变的影响,虽然这样预测看来还可能为时过早;但我仍这样预测。

我的第三个主题是别开生面的。人们已写过不少关于英国社会的“稳定”“宽容”或“一致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可能只是些陈词滥调,故意回避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然而,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已查出二十世纪中叶的广泛的政治一致性和较早一些世纪的英国宗教的宽恕精神之间的联系。这种宗教的宽恕精神集中表现在已确立的英国国教上,在没有引起大事纷扰的情况下,各种不同形式的新教都顺应了英国的国教。1970年,在勃贝克学院并入伦敦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之际,当我就“社会的变化”发表讲话时,我提出了“世俗的国教”这一看法,指明人们发现在法国和意大利

的天主教徒和反对天主教者之间、在许多北欧国家的路德教教徒和加尔文教派中间及美国的“圣经”地带^①存在一种偏激情绪，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的部分地区也有，而在英格兰没有这种偏激情绪。或许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词；即便可能如此，本书的第三个主题论述关于英国社会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宽容与一致性的性质和实际情况的一些问题，包括团结一致性（假定它曾存在的话）是否有助于实现有利的稳定局势，还是造成了不幸的停滞状态。

但是，我的确听到许多人喃喃低语云，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应是一个主题。1945年以来，所有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和社会状况都受到科学技术所发生的变化的极大的影响。这虽然是准确和意义重大的真实情况，却又是常事。但是，它们的相互关系是不易确定的。我们最好这样看待这种相互关系：科学技术给社会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提供信息，同时也从社会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得到信息；不要把科学技术看做是独立的和可能有类似魔力的实体，而这种实体以某种方法在对一个无生物即社会施加机械似的“影响”。此外，本书的一个目的是集中论述有关社会史的特殊问题。尽管如此，如果有谁在不十分重视科学发现和技术革新的情况下试图撰写现代社会史，那他就是个笨伯。我相信，我不是那种笨伯。

1945年至今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看来，四十年代后期人们的态度和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同当今人们的态度和生活方式相距遥远了。如果我将我回顾的时期看作是没有前后差异的时期，并在其中阐明关于这个时期内的我的三个主题和彻底探索这个时期内有关人口、饮食、家庭等的发展情况，这就根本没有公平对待这个时期。因此，我采用了一种基本的撰写历史的方法，即分期论述。

① Bible Belt：基督教圣经地带，美国南部严格信奉《圣经》的地带。——译者

为强调我所使用的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事态变化的方式，我将本书分为三部分，虽然无须说明，历史上不存在真正的转折点——当然不是指的大选。

我将第一个时期称为“社会的一致”时期，我认为这个时期是从1945年持续到大约1957年。正像事实迅速变得明显的那样，虽然这个时期(尤其是很有特色的最初几年)很受到战争残遗局面的支配，但1945年是战争结束和举行大选使工党政府上台的一年。1945年，像任何其他年代一样，是个很好的起点，同大多数年代相比，可能还是更好的起点。在1950年大选中，工党政府几乎丧失了多数票，并于1951年下台。但是，我曾提出这种论点：要概括英国的形势是很不容易的，要概括选民们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投票，或者选举工党或者保守党，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的事实曾有力地证明了我的论点：在这次大选中，实际上选举工党的人比选举保守党的人多，而且比1945年时选举工党的人还多。由于接下来是十三年的保守党统治，人们就不无道理地称这是政治上的转折点。但就社会史而言，在我看来，四十年代末期的主要课题继续是五十年代初期的课题，这样说是正确的。

1954年，大部分主要食品的定量配给办法终于结束，同年，关于采用商业电视的“法案”成为法律了。这些自然是发生了变化的迹象。就在1945年，保守党在获得更多的和最令人信服的多数票的情况下，在安东尼·艾登爵士领导下重新掌权，因为邱吉尔最后离开了政治第一线。然而，倘要我们寻一条真正的深邃的政治分水线，那么，它就应该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1956年，政府取消了肉类定量配给办法；正如政府统计学家所承认的一样，从这种意义上说，1957年是新的消费社会的第一年。

无论如何，我认为称做“通向自由之路”的第二个时期大约是从这样一个时候开始的。保守党人在哈罗德·麦克米伦的领导下，重

新组织起来了。1959年,在得到更多的多数票的情况下,他们继续赢得第三次大选的胜利。“富裕”这个词开始在各处随意地流传开来。人们不仅摆脱了战后简朴的生活,也摆脱了上溯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种种社会控制,实际上,有点十八世纪发行政府有奖债券的气氛。那时也出现了对社会的新的批评:如1957年出版的理查德·霍格特的《文化的用途》一书和1959年发行的包尔廷兄弟影业公司的电影《杰克,我一切都好。》等。确实,正像结果表明的那样,1964年工党政府侥幸再度上台,它不仅结束了持续十三年的保守党统治,而且在1966年大选中继续赢得了相当可观的多数票。但是,另一方面,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仅仅是表面性的。尽管英镑的价格严重疲软,最终导致贬值;但一般的富裕精神依然存在,政府继续进行了教育和文化的革新,进一步制定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措施,“放纵政策”在全国传播。

工党政府执政持续到1970年,那一年,它以极微弱的选票之差和有些意外地败给了保守党人。诚然,这是受到1968年和1969年由于多次爆发学生行动主义的事件的扰乱。但是,这种动乱决不能同1968年影响法国的大变动相比。实际上,1968年及其带来的后果,包括诸如把法定年龄降到十八岁等,标志着继续迈向“通向自由之路”的进步。不管在爱德华·希思领导下的新保守党政府的意图是什么,但很难看出,1973年以前,在生活方式或观念方面有任何重大变化。但是,接着是第一次石油危机、严重破坏工业和暴力行动逐步升级,开始了以萧条、衰落和减少生产为标志的“困难时期”。1968年北爱尔兰的暴力行动进入新的危机阶段,它日益使英国生活蒙上阴影。1973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是工党政府1975年举行公民投票批准采取的步骤。尽管有公民投票,要概括一下英国对欧洲的态度也并非容易。但是,毋庸置疑,在七十年代中期,英国在同欧洲进一步接触和加强世界主义的思想方面,